

## 《杰克·迈格斯》：重写帝国文学经典\*

彭青龙

**内容提要** 《杰克·迈格斯》是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对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的重写。本文运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通过比较两部小说的差异，论述狄更斯小说叙事中所包含的帝国思维和凯里文本中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

**关键词** 《杰克·迈格斯》 《远大前程》 帝国文本 反殖民话语 文化身份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 1997)是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1)的重写。作为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经典小说，《远大前程》生动刻画了以匹普为代表的英国底层人民追求远大前程所经历的艰辛和折磨，同时，也客观反映了宗主国殖民扩张和“社会隔离”的历史背景。基于狄更斯的小说叙事和文本所包含的帝国思维，身居后殖民主义语境、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凯里对之进行了“颠覆性”重写，使澳大利亚回到它应有的话语空间，从而建构出新的民族形象。本文运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通过比较两部小说的差异，论述狄更斯小说叙事中所包含的帝国思维和凯里文本中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

### 文本化帝国与去殖民化小说

在西方建立文化帝国的过程中，虚构体小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小说研究》项目（批准号07JA752003）阶段性成果之一。

“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身份和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掠夺重点当然是对土地的争夺，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sup>①</sup> 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小说，既承载反映客观存在的功能，又将所处时代的价值体系内化其中，从而使读者了解社会的变迁、人性的善恶和真伪。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文化空前发达，许多小说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帝国形象构建的行列。为了支撑和维护其世界征服者和文明使者的英雄形象，帝国调动道德、文化和种族优越性等意识形态，来支持它的阐释活动。那些反映国内现实的长篇小说在支持帝国形象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维多利亚作家和思想家，包括卡莱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特罗洛普和狄更斯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他们的文章、通讯和长篇作品来反映帝国的发展。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用文字参与大英帝国的自我再现时，显然都采取了一种视帝国为当然的态度。西方的诚直，优越感和力量，帝国扩张后的新版图，这些都是维多利亚的既定所得。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说，主流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即便不是直接描写帝国，也可能与帝国统治相关。<sup>②</sup> 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萨克雷的《名利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等文学作品无不在客观上反映了帝国的荣耀和价值体系，而正是这些现实主义的描写，强化了帝国在人们脑海中的意象。

这些“文学经典”在高举“日不落帝国神话”大旗的同时，又按照帝国的价值观贬低帝国以外的地方，称“非洲为暗无天日的大陆，亚洲为奇异的东方，澳洲为对跖地（下蹠角）”。<sup>③</sup> 即便是与帝国文化同根共祖的澳大利亚白人，也被描述成罪犯、小偷、蛮横的拓荒者、粗俗无知的移民和流浪汉。澳大利亚是一个用来流放那些不受欢迎的人，那些难以相处的亲戚的国土——地球的尽头。正如亨利·金斯利《西丽亚和巴顿家族》一书中的人物略带讽刺地指出的，澳大利亚已经成了“一个容纳大量乌七八糟垃圾的没有气味的污水沟，不管这种垃圾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在英国人看来，“自打发明了苏打水以后，澳大利亚是他们

① 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页。

②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③ Diana Brydon and Helen Tiffin, *Decolonizing Fictions* (Sydney: Dangaroo Press, 1993) 62.

最大的发现了”，它“一度成了饮酒纵乐后的去处”，<sup>①</sup>“比死还可怕的地方”。<sup>②</sup>

作为19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狄更斯在其作品《远大前程》中虽然没有如此苛刻的描写，但显而易见他将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马格维奇拒之门外，视之为“他者”。在文本中，马格维奇被描写成一个浑身上下都透着犯罪气息的外人，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即使匹普最终接受了正被警方追捕、狼狈不堪的马格维奇，但那时马格维奇已经病入膏肓，后来他的死亡也昭示出狄更斯的帝国逻辑，即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犯人是不能被遣返回国的，即使回来，也难逃死亡的命运。正如罗伯特·修斯所说：“狄更斯在英国人关于这些罪犯在澳大利亚的定居的推想上做了一些编排。他们可以成功，但是他们很难在真正的意义上回归。他们可以在技术和法律的意义赎罪，但他们在那里遭受的一切将他们扭曲成永久的外人。当然，他们可以赎身，只要他们留在澳大利亚。”<sup>③</sup>

帝国作家对殖民地的贬低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分裂，并使他们患有“文化奴婢症”。“在澳大利亚，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反抗情绪，但是相当数量的澳大利亚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仍然为帝国小说引发的‘文化谄媚’的复杂现象所困惑，甚至继续附和这些文本，甘愿臣服于大不列颠或者欧洲。尽管澳大利亚已成为独立的领土，但是，它们依然起码是部分地与帝国的历史及其共谋的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sup>④</sup> 澳大利亚人甘愿接受帝国“画像”的自卑情结延缓了其民族文化的发展，进而影响了独立文化建构的进程。亲殖民文化和反殖民文化两股力量之间的博弈，增添了文化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在政治上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但其文化身份始终是困扰澳大利亚的一个大问题。“将民族身份视为一个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和殖民性的问题确实有其理由。对于气候、地貌和土著居民无法形成连续性、心理和物理距离都非常巨大的国度，‘流放之后我是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新自我的界定——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和社会的——过去需要，现在显得更加紧迫。”<sup>⑤</sup>

于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殖民地作家发起了一场摆脱帝国话语控制的“文本革命”。他们对那些曾经支持帝国征服和殖民、影响个人和民族意识形态、而

① Henry Kingsley, *The Hillyars and the Burton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3) 238-239.

② 奥斯卡·王尔德《认真的重要性》(1835)，第一场。印度的“经济”和气候在这部剧里受到讽刺。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

③ 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页。

④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9-300页。

⑤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且还在继续影响人们命运的欧洲小说进行了“去殖民化”改写或者重写，使那些在殖民统治期间“失声”的民族再次回到话语空间。杰西卡·安德森的《河边的雀争鸣》探讨了英语文本对殖民主体的异化；帕特里克·怀特的《沃斯》对探险英雄的个性及其价值提出质疑；土著作家马德鲁鲁·努加恩在《沃雷迪医生给世界末日开出的处方》和《巫师高手》中，以土著人的视角将帝国和移民小说改写成侵略和种族灭亡的作品；萨利·摩根在其自传体小说《我的位置》中改写了A. B. 法塞《幸运一生》中的术语，并通过一个白人模糊复杂的家史，追寻了黑人的血统……这些具有反话语、富有寓意性、暗示性和元批评作品的问世，揭露了帝国文本中的谎言和歪曲，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

凯里是重写帝国文本的杰出代表之一。继1988年通过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揭露帝国远征的凶残之后，凯里又将目光投向了帝国文学经典《远大前程》。“我读狄更斯很费劲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毫无疑问，那本书（或者我们成长过程中读的那些书）都鼓励你采纳英国人的视角。如果用那种观点，你会喜欢匹普，他是你的人，也因此会突然认为马格维奇是一个极端险恶的‘他者’。然而，我再读这本书，掩卷长思后……对狄更斯有些恼火，为什么哈维山小姐的金钱比马格维奇的钱体面？所以当我重新想象这本书的时候，我在其中安排了一个知道真相、但又歪曲事实的作家，一个狄更斯式的人物，也就是我小说中的托比斯·欧茨。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人物复杂化，努力做到对他少一点苛刻，多一点喜欢。”<sup>①</sup> 凯里对狄更斯歪曲马格维奇的不满表明，他执意要写一本小说，来“修正”被帝国文本“丑化”和“边缘化”的部分，从而再现历史的本真性，重塑民族形象。

### 《远大前程》中的殖民叙事

现代澳大利亚曾经是英帝国的一个罪犯流放地。美国独立之后，英国不仅失去了一块海外殖民地，而且也丧失了至关重要的罪犯投放所。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位于南半球的澳洲大陆。1788年，澳大利亚首任总督菲利普率领两百多名海军官兵，押送第一批流放犯在新南威尔士州登陆。他们屠杀了长期居住此地的土著居民，用血与火开辟了一条殖民主义的道路。据史料记载，在此后的数十年

<sup>①</sup> Ramona Koval,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Carey, Broadcast on Books and Writings on Friday, 12 September 1997.

间，共有 168000 余名犯人放逐到这个人口稀少的大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刑事犯、政治犯、骗子和小偷。因此，澳大利亚是在“监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初人们并没有把它看成天府之国，一个提供新生活的乐园……对于最早的欧洲人来说，澳洲是他们想象中的监狱。那里自然环境恶劣（比如季节的颠倒），与监狱实无两样。”<sup>①</sup>

虽然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不是帝国的历史档案，但这部带有强烈殖民叙事的文本充斥着作者的帝国殖民思想，承载着社会、历史档案的功能。一方面，小说显示出在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狄更斯“能够对农村贫民的破产、城市工人的失业和底层妇女、儿童的悲惨命运进行全景透视和‘令人感动’的描写，从而使人们透过维多利亚时代表面上的繁荣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幕”；<sup>②</sup>但另一方面，小说也透露出作者“认同于帝国社会隔离的政策，认为澳大利亚是发配作奸犯科的英国人的地方，被送往那里的人只能在那里重新做人，而不能指望日后再回到英国本土”。<sup>③</sup>这种游离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使小说带有两面性——既同情劳苦大众的不幸遭遇，又宣传帝国的殖民理念，折射出作者“种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双重文化人格”。<sup>④</sup>

狄更斯分裂的双重人格、尤其是殖民情结在对马格维奇的刻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他的笔下，马格维奇无论是面容和衣着，还是动作和语气，都是一个凶残的罪犯：“这是一个面容狰狞的人，穿了一身劣质的灰色衣服，腿上拴了一条粗大沉重的铁……他一跛一跛地走着，全身发抖，还瞪着双眼吼叫着。”<sup>⑤</sup>他掐着匹普的脖子，威逼他说：“明天一大清早，你要把锉子和吃的东西带给我……要是你不给我办事，或者你哪怕有半句话不听我的，不论这话多么微不足道，我一定会把你的五脏六腑挖出来，放在火上烤熟，再把它们吃掉。”<sup>⑥</sup>此外，狄更斯还不惜笔墨暗示马格维奇具有动物的特征。“我平时看惯了家里一条大狗吃东西，现在相形之下，觉得这人的吃相和那条狗实在有几分相似。这人一口等不得一口，用足力气，急啃狠咬，和那条狗根本没什么两样。……一边儿吃，一边儿斜着眼睛左看右看，好像四面八方随时都会有人赶来抢走他这个饼似的。照我

①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② 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③ 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第192页。

④ 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第191-92页。

⑤ 狄更斯《远大前程》，罗志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⑥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4页。

看，他这样心神不定，哪里还顾得上品一品这个饼的滋味。假若有人跟他一起吃，难免他连人都会咬上一口。”<sup>①</sup>

虽然狄更斯在小说开篇之初就将马格维奇描写成一条丧家的“狗”，或者具有“兽性”的野蛮人，但“狗”诚实外向，代表着忠实、开放以及适应性，因此狄更斯对像狗的马格维奇不乏赞许与同情。马格维奇遭帝国驱逐，成为一只流浪狗，但由于其天生的秉性，“他”最终还是想回到自己的主人身边。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他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成为当地的巨富，不仅银行里有大笔存款，而且还有几处价值可观的地产。然而他对英国依然梦牵魂萦，于是通过律师，暗中秘密资助曾经帮助过他的匹普，希望能把他培养成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马格维奇资助匹普固然有满足其帝国末等公民虚荣心的需要，“只要我在心里暗暗地想起自己正在培养着一位绅士，我就得到了补偿，一切怨气都消失了。有时我走在路上，那些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移民们气宇轩昂地走过，扬起的尘土直冲我的面孔。你知道这时我想什么？我自言自语：‘我正在造就一位你们不能相比的绅士！’”，<sup>②</sup>但同时向读者展示其“知恩必报”的善良的一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开篇之初对马格维奇的“丑化”。

尽管如此，狄更斯描写的马格维奇这个人物依然是他的殖民思想所潜意识否定和排斥的。马格维奇从流放犯，到澳大利亚巨富，再到非法回国被处死的罪犯，显示出“劣等公民”的生活轨迹。狄更斯在小说中“设计”马格维奇在临刑前病死，表面上是动了恻隐之心，为其开脱，但实际上这是他维护帝国法律的一种表现，因为马格维奇的“罪行”并没有因此被赦免：“严禁马格维奇返回英国不仅仅是对罪囚的惩罚，而且有帝国的利益所在：英国国民可以被遣往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但决不允许他们‘重返’政治文化中心，因为正如狄更斯所有小说所证明的那样，政治文化中心经过慎重周密的布置和规划，由大大小小的人物一层一层盘踞着。”<sup>③</sup>

狄更斯的帝国殖民情结不仅表现在马格维奇这个流放犯身上，也表现在破产后的匹普身上。如果说马格维奇的命运集中体现了狄更斯维护帝国法律的思想，匹普后来的发迹则表明狄更斯接受了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海外殖民地乃是帝国的经济前沿，应该让海外资产远远不断地为帝国输血，以促进宗主国的社会发展和

① 狄更斯《远大前程》，罗志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②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276页。

③ 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8页。

## 《杰克·迈格斯》：重写帝国文学经典

生活进步。<sup>①</sup> 马格维奇死后，匹普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好在他得到了乔的帮助，才没有因负债累累而锒铛入狱。此后，他像其他殖民者一样，到非洲做生意十年，通过掠夺当地人的资源，重又跻身上流社会。

匹普出身卑微，是生活在帝国中心以外的边缘人，他从边缘到中心、又从中心到边缘，最后又回到中心的生活历程折射出帝国的成长和扩张。虽然当他得知所花的钱来自一位流放犯时感到羞辱，但他正是依靠这些看似“不体面”的钱财才能在帝国中心伦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为自己日后的财富掠夺积累原始资本。可以说，匹普的远大前程和绅士之梦是通过自己对东方他者的掠夺完成的。像其他英国人一样，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对东方财富的渴望。“我不会仅仅停留在对船运保险的投资中，光这样我是不满足的，……我要到东印度去，去做丝绸、披肩、香料、染料、药品以及珍贵木材方面的生意……我还要到锡兰去做生意，特别是去做象牙生意。”<sup>②</sup>

狄更斯对马格维奇的刻画暴露出其帝国法律卫道士的心态，而对匹普非洲探险的描述则彰显了其种族主义的殖民观，即白色人种对黑人的统治，这使这部小说明显具有传统帝国叙事的特征。赛义德指出：“狄更斯处理好了澳洲问题，又出现了另一种态度和指涉结构，这种结构暗示了大不列颠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和旅游往来。匹普在殖民地做生意，表现得不算特别出色，因为几乎所有狄更斯笔下的那些商人，那些一意孤行的亲戚和耸人听闻的局外人都与大英帝国保持着相当规范和稳定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直到最近才引起批评界的重视。新一代的学者和批评家在这些西方文学经典中看到了对所谓次大陆的经久不衰的兴趣，那里的居民是有色的劣等民族，有待许许多多鲁滨孙·克鲁索去改造他们。”<sup>③</sup>

## 《杰克·迈格斯》中的反殖民话语

后殖民主义争辩的实质是“叙述”的争夺。为反击帝国文本，彼得·凯里的小说《杰克·迈格斯》改写了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并把被狄更斯“边缘化”和“丑化”了的马格维奇放在叙述的中心位置。在凯里的笔下，作为马格维奇化身的杰克·迈格斯是一个心地善良、经历人生风雨、勇敢睿智的英雄。年

① 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② 狄更斯《远大前程》，罗志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

③ 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8-169页。

青的时候，他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服刑期满后在悉尼开砖瓦厂发了财。之后他返回伦敦寻找他曾经帮助过且已成为英国绅士的匹普斯。匹普斯闻讯后躲了起来，迈格斯只好在他隔壁的一个名叫珀西·巴克尔的绅士家里做佣人，希望伺机寻找匹普斯。珀西与日渐走红的青年作家托比斯·欧茨过往甚密。以帮助找到匹普斯为条件，欧茨说服迈格斯做了自己研究罪犯心理的“实验对象”。但匹普斯一直没有现身，欧茨也言而无信，愤怒的迈格斯只好利用欧茨与妻妹的奸情，诱迫欧茨烧毁其歪曲自己的手稿，并说出匹普斯的藏身之地。迈格斯最终找到了藏身于同性恋俱乐部的匹普斯，但后者却把枪口对准了恩人。一场冲突后，迈格斯携同救他的梅西逃离伦敦，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儿女成群，事业有成，并两任郡长。

凯里在小说里赋予迈格斯充分的叙述空间，让他有机会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申诉，从而消解狄更斯对马格维奇的丑化。迈格斯在做佣人期间，经常溜进匹普斯的房间，写信讲述他苦难的童年和不幸的爱情故事，期待他的“儿子”匹普斯能够了解事情的原委，理解他内心的感受。他的童年就像雾都孤儿奥利弗·特维斯特一样，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后来布列顿妈妈收留了他，但她威逼才十岁的迈格斯去做偷鸡摸狗的勾当。在共同的“冒险”生涯中，迈格斯与布列顿妈妈的养女索菲娜相爱，并有了爱情的结晶，但狠心的布列顿妈妈强迫索菲娜吃药流产。由于布列顿儿子的告密，索菲娜被捕入狱。虽然迈格斯主动承担罪责，企图为索菲娜开脱，但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推向断头台。迈格斯本人也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迈格斯给匹普斯写信，实际上是匡正被帝国歪曲的历史，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只可惜匹普斯并不理解迈格斯的良苦用心。小说中布列顿妈妈的英文拼写是 Ma Britten，其读音与 Briton 相似，暗指布列顿妈妈是不列颠帝国的化身，也是迈格斯走向犯罪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布列顿妈妈把迈格斯逼向了罪恶深渊，托比斯·欧茨则用帝国作家的逻辑来审视这一切。小说中作家欧茨与杰克·迈格斯的关系暗含着中心-边缘的关系。欧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话语的代言人，他极力攫取关于“‘他者’全面的知识”，<sup>①</sup>而单纯的迈格斯则被迫充当欧茨的实验工具，这是殖民帝国对其臣民实施霸权的例证。欧茨打着为杰克·迈格斯消除面部之疾的幌子，利用麻醉术，使迈格斯处于“昏迷”状态，并随心所欲地“改变”迈格斯的记忆，

<sup>①</sup> Peter Carey, *Jack Muggs*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或者诱使他说出内心的秘密。他把自己比作外科医生和地质学家，来研究一个澳大利亚罪犯：“这是一个罪犯的心理……等待它的第一个地图绘制员。”<sup>①</sup>他这样处心积虑地“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将来能够捞取更多的钱财。“我刚刚在本里记录完这一切。钱肯定会随之而来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恩特维斯特将为这个连载给我一大笔钱。”<sup>②</sup>欧茨对妻子的表白，道出了他让迈格斯作试验的真正目的：“他走在有回响的街道，满脑子里想着钱，就像他在作品《法国大街》里刻画的一名守财奴一样。”<sup>③</sup>

托比斯·欧茨不仅贪财，而且还是个好色之徒。虽然已有妻室，但他与妻妹莉齐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莉齐时年18岁，欧茨利用她的天真，与她发生性关系，致其怀孕。为了掩盖自己与莉齐的暧昧关系，他一方面用项链等贵重物品哄骗莉齐，另一方面又对妻子玛丽亚撒谎。最后莉齐死于难产，事情败露，欧茨又将全部责任推脱给迈格斯。<sup>④</sup>这些事实表明，欧茨的道德水准与高尚文学作品的创作之间有巨大的鸿沟，这是对帝国经典和作者的一个莫大讽刺。

表面上看，迈格斯重回伦敦似乎打破了许多人的平静生活，但事实上，他之所以不受欢迎，甚至遭人憎恨，是因为他打破了帝国的社会秩序，威胁着帝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当被问及回来的理由时，迈格斯声称：“我这是回家……我回来是为了文化……歌剧艺术，影剧院，我要花时间补上这些。”<sup>⑤</sup>可后来他发现，他梦寐以求的“家”已面目全非，“在他周围，到处都是杂乱、喧嚣、震耳欲聋的左冲右撞，刺鼻的马粪味、油烟——一个乌烟瘴气的伦敦”，<sup>⑥</sup>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人”。养子匹普斯逃避他，欧茨把他作为实验工具，巴克尔也因为害怕迈格斯“抢了”他的情妇梅西而嫉恨他。在他们眼里，迈格斯是一个扰乱“自我”的“他者”。<sup>⑦</sup>正如评论家西格朗·梅内格所言：“在小说推进的过程中，杰克·迈格斯越过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许多界限，这些界限由来已久。在以财富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城市，澳大利亚流放犯强烈动摇了一位绅士房子在都市中心的所有权。迈格斯不仅引出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问题，而且打破了现行的社会秩

① Peter Carey, *Jack Maggs*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0.

② Peter Carey, *Jack Maggs*, 140.

③ Peter Carey, *Jack Maggs*, 237.

④ Peter Carey, *Jack Maggs*, 390.

⑤ Peter Carey, *Jack Maggs*, 5.

⑥ Peter Carey, *Jack Maggs*, 2.

⑦ 罗兰·巴特将城市看作是“我们与他者会面之处”，参见 Jane M. Jacobs, *Edge of Empire -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4。

序。……因此，迈格斯的伦敦之行引起了社会和情感的动荡，同时也使人对维多利亚的偶像和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帝国故事产生了怀疑。”<sup>①</sup>

西格朗·梅内格所说的“偶像”和“帝国故事”实际上指的是狄更斯和《远大前程》。凯里借助有关狄更斯的历史记载，通过描写托比斯·欧茨与迈格斯之间的冲突，讽刺了帝国小说家为人所不齿的人格和其作品中对流放犯的歪曲。小说中，“托比斯·欧茨的情人莉齐融合了狄更斯两个妻妹的特点：当17岁的玛丽娅·赫加斯死于他家时，狄更斯陷入了不同寻常的忧伤。几年后，当他的妻子凯特离他而去时，他与乔治娜·赫加斯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公众对他的怀疑。事实上，他与女演员艾伦·特南早已陷入爱河，对此他又矢口否认。”<sup>②</sup>托比斯·欧茨在情感上的虚伪与他对杰克·迈格斯的态度别无二致。在哄骗迈格斯充当其实验工具之初，欧茨信誓旦旦地保证，在实验结束之后，他一定帮助迈格斯找到养子匹普斯，但他没有信守诺言，一再拖延实验的时间，也没有按照承诺，客观公正地将迈格斯“写进”小说，而是对他的故事做了巨大的改动和歪曲。

迈格斯与欧茨等人的冲突实质上是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是新旧文化身份的冲突。作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迈格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但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固守英国人的文化身份，本想带着荣耀回归故里，没想到受到了代表帝国中产阶级的人们的冷遇和抵制。虽然他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我是他妈的地道的英国人，我有英国人的事情要处理，我不愿意终日 and 虱子蟑螂住在一起，我属于我的伦敦，”<sup>③</sup>但经过一系列的不幸遭际，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不被帝国所接受，他新的文化身份应该是澳大利亚人。所以，迈格斯从青年时代离开伦敦到澳大利亚，再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最后又回到澳大利亚，是一个“寻根”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文化身份的过程。在彼得·凯里的笔下，澳大利亚不再是狄更斯的“悲惨世界”，而是“工人阶级的乐园”。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远大前程》与《杰克·迈格斯》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前者贯穿狄更斯的殖民主义思想，而后者则反映凯里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即重新审视和纠正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在《远大前程》里，匹普是主角、英

<sup>①</sup> Peng Qinglong,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6) 109 - 110.

<sup>②</sup> Caryn James, "Great Expectat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8, 1998, 10.

<sup>③</sup> Peter Carey, *Jack Maggs*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8.

雄，他从穷人到富人的发迹过程，完全依赖于殖民地的财富——先是马格维奇的匿名资助，后是依靠与东方殖民地的贸易。但在作者狄更斯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对马格维奇的遭遇给予某种程度的同情，但从其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帝国利益的维护者。凯里则反其道而行之，并将化名为杰克·迈格斯的流放犯置于叙述的中心位置，重新塑造了马格维奇的英雄形象，同时对身为狄更斯化身的作家托比斯·欧茨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凯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委：“狄更斯的马格维奇是无耻、阴险、骇人和危险的。狄更斯鼓励我们把他看成一个‘他者’。但这是我的观点，并且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认为：马格维奇是我的祖先……我要写他的故事。我想重新写他，拥有他。我无意弱化他阴险或者危险的一面，但是我想把狄更斯赋予英国英雄匹普的关爱和柔情同样以第一人称叙述给予他。”<sup>①</sup> 凯里对《远大前程》的改写实际上赋予了澳大利亚文化身份以新的寓意——虽然无法摆脱帝国的影响，但澳大利亚也已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作者简介] 彭青龙，男，1967年12月生，博士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英语副教授。主要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近期著作有《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文本性与历史性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简史》、《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澳大利亚文学》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

<sup>①</sup> “Writing Jack Maggs,” text of a speech launching *Jack Maggs* held b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